

● 新闻传播学

新闻采访制度化的历史进程及原因

郑一卉, 单 波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郑一卉(1978-), 男,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系硕士生, 主要从事比较新闻学研究; 单 波(1964-), 男, 湖北天门人,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比较新闻学研究。

[摘 要] 真正的新闻采访最早出现在18世纪中期的美国, 几十年后, 欧洲和中国的新闻界都开始把采访活动引入新闻实践。到20世纪初, 采访活动已经成为了新闻界的一种制度和规范; 采访制度化有深刻的经济、政治、文化原因; 自由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报业资本的增长是采访出现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物质基础; 政治民主化运动是采访制度化的主要推动力; 文化环境的改变也在采访制度化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关键词] 新闻采访; 制度化; 历史; 发展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3-0363-06

当今的新闻学研究倾向于探讨现存的理念和问题, 而不注重分析这些看似理所当然之事物的演进历程。比如说, 学者们经常研究如何保证新闻的客观性, 而不追问为什么保证新闻的客观性成为了业界的行为准则。19世纪之前的新闻界还不知道“客观”二字的含义, 经过上百年的发展, 客观性理念已经成为了毋庸置疑的基本原则, 并上升到了职业道德的高度。同样, 新闻采访也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学者们热衷于探索如何搞好新闻采访, 而忽视了对新闻采访制度化过程的研究。难道采访一出现就成了一种规范? 事实并非如此, 新闻采访活动甚至是在报纸出现几百年后才兴起的。经过了百余年的发展, 采访才成为新闻工作的核心内容。近现代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合力加速了采访的制度化进程。

新闻采访首先出现在美英等国, 而后经由外国报刊和外国记者传入中国。本文拟从中西互动的角度, 从政治、文化、经济层面探析采访在中西新闻界的制度化过程。

(一) 美国早期的采访活动

早期北美洲殖民地的报纸用大部分的版面刊登英国报纸的新闻作品, 也登少量的训导文章、幽默小品和名人信件。用现代的眼光看, 那时的报纸上还没有“新闻报道”。新闻记者和采访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采访出现之时, 也就是专业记者出现之时。或者说, 记者不采访就不能称为记者。19世纪20年代之后, 政治斗争和市场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 美国一些主要的日报开始雇用记者采写新闻。当商品性

极强的便士报在 19 世纪 30 年代出现之后,美国记者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报道本地新闻,特别是从警局和法庭得来的犯罪新闻。对于美国新闻界来说,19 世纪 30 年代以前,采访还没有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活动。那么,新闻采访到底是在何时何地出现的呢?现代学者曾试图确定历史上第一次采访活动的年代。

有学者认为,新闻采访活动最早出现在 16 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城,因为那里是近代资产阶级报刊的发源地,当地还出现了“新闻记者公会”^[1](第 18 页)。美国内战时期,《纽约论坛报》的记者曾使用电话采访政要^[2](第 19 页)。美国学者迈克尔·舒德逊(Michael Schudson)提到:“1859 年《纽约论坛报》的赫拉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采访摩门教领袖人物布里格姆·扬(Brigham Young)应该算是一次真正的采访。”^[3](第 73 页)有的学者提出,《亚特兰大宪法报》的记者亨利·格雷迪发展了采访术,是他使采访成为既是收集消息又是解释消息的手段^[4](第 306 页)。舒德逊认为,采访活动起源于美国,是美国报人的创造发明。1871 年,《纽约世界报》的汤普森·库珀(Thompson Cooper)称采访为“现代的和美国的调查方法”。1902 年,他在给著名英国记者威廉·斯帝德(William Stead)的信中写道:“采访是美国人与众不同的发明。”^[3](第 74 页)采访定义的不确定性是引发以上的争论的重要原因。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采访活动?如果只要是为实现传播目的而进行的信息收集活动都可以被称作采访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的“采风”、“采诗”活动也是采访。但这样的理解有失偏颇。在 19 世纪的美国,“采访”(Interview)这个词的涵义是很宽泛的,只要是两个人之间碰面交谈都可以被称作“采访”。如果从狭义上理解,只有新闻记者为新闻媒体收集信息而进行的正式的访问活动才是新闻采访。正是在这个前提下,舒德逊才得出了新闻采访起源于美国的结论。他还写道:“采访既指一个公众关心的人物和一个专业记者之间的一种互动,也指这种互动的文学形式。”^[3](第 74 页)这也就是说采访还关乎报道写作的方式。林肯总统经常与美国记者进行非正式的交谈,但从没有记者引用他的原话。这样的访问活动在舒德逊眼中当然还不能算是“新闻采访”。他写道:“一般来说,当时的报人只是利用他接近政治家的便利去游说,用尽甜言蜜语,以实现他的目的,有时还充当两个敌对党派的调解人。”^[3](第 76 页)

(二)中国早期的新闻采访活动

第一批中文近代报刊是英国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1815 年,米怜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并雇用中国刻字工梁发到马六甲为其工作。据此,有学者认为,从这时起,我国的新闻采访活动崭露头角,梁发是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最早的记者之一^[1](第 20 页)。根据戈公振考证,梁发为我国首位基督教传教士。他到马六甲之后不久即受洗入基督教,从此毕生服务于伦敦布道会,以刻印中文报刊,撰写宗教小册子终其一生。他的工作是每逢粤省科举考试,携带《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与宗教书籍赶赴考场分送。(后经方汉奇等考证,梁发并未赴考场分送报纸)来回于马六甲与广东之时,借海船之便在南洋诸国出售刊物^[5](第 5 页)。《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本来只是一本协助布道的宗教刊物,偶尔有新闻混杂其中,梁发亲自采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 1815 年前后,英国人恐怕还不知道什么叫做采访。“1900 年之后,在美国人的指导下,英国人才接受了采访”^[3](第 77 页)。梁发理应不能从英国传教士那里学到采访术。

继英国人之后,美国公理会派赴中国的第一名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英文报纸《中国丛报》。1839 年 6 月和 9 月,裨治文两次访问了钦差大臣林则徐。首次是为报道虎门销烟,第二次访问他向林提到战争威胁,林答之以“打仗不怕”。此语刊出后不久,中英开战^[5](第 14 页)。虽然裨治文与林则徐交谈的目的是为了试探他的态度,并为美国制定侵华政策提供依据,但这也可以算是一次真正的采访。

当大批外国记者采访太平军将领之时,中国报纸大多登载的是训导文章、政府公文、译自西方报纸的文章、道听途说得来的新闻等等,真正意义上的采访还没有出现。早期在中国进行新闻报道活动的大都是外国传教士,1884 年中法战争期间,英国《泰晤士报》曾聘柯乐洪为驻华记者。直到 19 世纪末,西方大媒体才开始大举向中国派出记者。19 世纪 70 年代,根据“三社四边协定”,远东的新闻发布权由路透社获得。1870 年路透社在上海组建了远东分社。《纽约世界报》的著名记者詹姆士·克瑞尔曼(James Creelman)是第一个采访法国总统的人(1897 年采访费利克斯·福勒)^[3](第 73 页)。他于 1894

年来华,是为了报道中日甲午战争。1883年6月《巴黎时报》刊登了中国代表曾纪泽对该报的谈话记录。1895年《纽约先驱报》记者戴维逊因带有厦门美国领事的介绍信和许多其他名人的函件,又经淡水海关税务司马士引见,成功采访了台湾巡抚^[6](第35页)。总而言之,正是由于这些专业记者的涌入,中国报界开始了解新闻采访活动。

国人所办的早期报刊长期热衷于翻译外国报纸稿件,刊登鼓吹洋务运动的言论,也登载少许商贸信息。维新派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报刊热衷于政治宣传与论战,国人自己进行的新闻采访还没有出现。其实,直到20世纪初,国人所办报刊几乎没有雇请任何“新闻记者”。“报纸之有访员,其处仅本埠延聘一二人,外埠则除京师照登邸抄外,各省会则摘录一二督抚辕门抄。即本埠访事,亦大抵以沪上各衙门之房吏充之……故访员资格,如是而已”^[6](第265页)。当时的访员采集新闻的方法“打听、探听”,而不是采访。国内某些大报只是在有重大事件发生时派出访员采访。如《申报》主持人美查于1884年委派一西人而不是华人为随军记者到中法战争的战场采访^[7](第15页)。直到“二次革命”后,新闻界才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体现在政论的衰退和新闻的加强。各大报纸纷纷聘请记者长驻京城,主要采访中央要闻。黄远生、刘少少、邵飘萍等名记者脱颖而出。至此,中国新闻采访的时代来临了。

二

诚然,寻找单个的采访首创者的行为是幼稚的,我们应该去探求采访为什么会出现,什么时间在哪里出现,为什么在那个时代和那个社会出现,而不是费力发掘新闻史上的“伟大人物”。

新闻采访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记者一开始也不是受人尊敬的。虽然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报道活动就在美国兴起,但在几十年后它仍然遭到一些守旧报人的嘲笑。1868年,马克·吐温写道:“我认为用这种方法(采访)取得大人物的观点有点阴险,可有许多人都在用。”^[3](第77页)美国人对新闻采访的蔑视也许是因为对政党报纸心有余悸,但欧洲报人却认为采访简直就是对报界的侮辱,毫无益处。1869年《伦敦每日新闻报》的记者写道:“现在美国纽约的一些日报用一种所谓‘采访’的奉承拍马手法采写新闻,这简直是对新闻工作者的侮辱。”^[3](第78页)。蔡寄鸥《武汉新闻史》中也提到:“穷酸的新闻记者们,哪里有出入衙门的资格呢?每日采访的新闻,只是从街头巷尾,抄得几张招贴,从茶楼、酒馆窃听几句传言,再加上自己的意见,渲染一下。真是访员访员,只要谎儿撒得圆。”^[6](第467页)

虽然有这么多的非议,但新闻采访没有被扼杀于襁褓之中,反而不断发展,最终成了新闻工作的核心内容。原因何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合力催生了新闻采访,也给予了它强大的生命力。

(一) 经济发展与新闻采访制度化

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新闻业的发展,同时也为新闻采访的诞生提供了必要条件。报纸从一出现就与经济消息分不开,随着商业的发展,报纸刊登的经济新闻增多,商人对报纸的依赖性加强,这就要求报纸必须刊登全面准确的经济事实。要保证经济消息的准确性,就必须采访。同时,商业的发展给予了便士报出现的理由,便士报又大大加强了新闻界的经济实力,使报社雇用大量记者采访新闻成为可能。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和传教士之所以可以采访政府官员和重大事件,一方面是因为洋人享有特权,不管是无能的清政府还是北洋军阀都患有“恐洋症”。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财力作后盾。当时国人所办报刊的规模都不大,所以就当时的交通条件和经济实力来说,专门派本社记者赴外埠报道突发事件的还不多见^[8](第114页)。民国初年,民族资本发展迅速,带动报业进入了短暂的繁荣时期。黄远生从民国元年起就活跃于政要之间,随后邵飘萍也采访了不少名人,胡政之与萧乾还前往欧洲采访。

在1840年电报出现后,几家纽约报纸于1848年组建了美联社。美联社可以说是采访活动的推动者之一。因为必须给许多政治立场不同的报纸提供新闻,所以它的报道必须保持“客观”,只有这样才能让所有的客户满意。报社根据简单的事实,再去评论发挥。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使用采访这种加强新闻客观性的手段。1925年肯特·库珀(Kent Cooper)就任美联社总经理后即要求:无论事件的大小,

都应该靠采访获得新闻^[3](第 86 页)。

社会分工的发展催生了新闻记者这个全新的职业。即使在便士报已经站住脚的 19 世纪 40 年代,美国报纸正式雇用的记者还是很少的,编辑们利用电讯、剪辑交换消息,而且报纸只有编辑部而没有记者部。后来,由于编辑工作的复杂化和编辑部的扩大,需要进行工作的专业化分工。到了 19 世纪 50 年代,美国出现了首席记者,采访本地消息。1854 年《纽约论坛报》就有了 14 名记者和 10 名编辑^[4](第 305 页)。我国报刊也是在发展壮大后才开始雇请记者。姚公鹤在《上海报纸小史》中写道:“今日无论何项日报,其内部均划成三部:一、编辑部…二、营业部…三、印刷部”^[6](第 265 页)。可见记者无处安身。顾执中回忆他刚刚进入《时报》工作时的情形:“原来在中国报社在此以前,几乎只有编辑,没有采访……大约从这时候起,上海的报社,其编辑部除了编辑人员外,也有几个在外面活动采访消息的记者。”^[9](第 181 页)

(二)政治民主化与新闻采访制度化

采访的出现是和客观报道活动紧密联系的。采访是加强新闻客观性的一种手段,是新闻客观性原则的外在表现。刊登被采访者的原话总比报人自己的叙述要显得客观一些,靠记者亲身去体验和考察也比“合理想象”更接近事实。而客观报道又是与政治民主化分不开的。

1830 年以前,美国报纸被认为应当报道相关立场而非保持中立^[10](第 8 页)。报纸上充斥着政论文章,几乎没有靠采访得来的新闻。随着宪政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发现,政党报刊互相攻击诋毁不会给民主带来任何好处。政论文章不能完全满足大众的需要。新兴的中产阶级积极向权力靠拢,是报纸的主要读者。他们把公平、民主作为一种政治要求,只有客观报道才能满足这种要求。在 19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因十分喜欢美国报界的新闻采访,丹麦自由报人亨瑞克·卡乌灵(Henrik Cavling)几次造访美国。他写道:“记者和采访是这些报纸的中心……这是理想的新闻事业。这些报纸的撰稿人是新闻记者,而不是审美家,也不是政客。这些是为下层社会的人民写作的报刊。”^[3](第 79 页)诚然,无论美国的报刊是不是为下层社会的人民写作,但是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美国报刊的读者已经不仅仅是政客和商人了。舒德逊指出:采访是一种特别适合民主社会的监督方式^[3](第 93 页)。只需要一个例子就可以很好说明这一点,即揭露丑恶现象的报道几乎都是靠采访完成的。民主不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会允许有揭露反民主的丑恶现象的监督方式出现。为什么新闻采访最早出现在美国?这与当时美国的政治民主化程度有关。19 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处在所谓的杰克逊时代,“杰克逊时代的中产阶级革命不仅体现在经济上,在政治上也具体可见……选举人财产资格限制,到 1820 年已绝迹。1840 年,大部分州的白种男性拥有投票权”^[10](第 48 页)。稍后的美国内战是一次十分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极大的推进了美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与美国政党报刊时期的情况相反的是,我国报刊刊登的政论文章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报界的声誉。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与保守派在报纸上展开政治论战。有人写道:“至戊戌维新……暨乎新党当国,政治上秘密日以揭破,此前贱视新闻业因而设种种限制之习惯,复悉数革除……而往者文人所不惜问津之主笔访事,至是美其名曰‘新闻记者’,曰‘特约通信员’,主之者既殷殷延聘,受之者亦唯唯不辞。”^[6](第 467 页)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政治的民主化程度不能与美国相比。就当时的国情来说,维新派与保守派在报纸上展开论战是民主发展的表现,所以报界声望提高是合乎情理的。

国内的新闻采访活动于清王朝分崩离析之际崭露头角。满清王朝内外交困,无暇顾及许多“离经叛道”的举动。当时“洋为中用”之风盛行,各种西方思潮大量涌入,而报纸是其主要传播媒介。华文报刊影响力与日俱增,也使得原来只有外国记者进行的采访活动为国内新闻界所接受。戊戌变法时期,由于热衷于论战,采访还没有在新闻界普及。辛亥革命虽然不彻底,但还是大大促进了民主的发展。所以中国新闻界第一批名记者出现在辛亥革命之后。

(三)文化环境与新闻采访制度化

美国内战后,其文学界进入了现实主义时期。威廉·迪安·豪威尔斯和亨利·詹姆士等文学巨匠

掀起了反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的现实主义浪潮。到了世纪之交,自然主义开始风行。报纸作为文学的重要传播者也深受影响。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发展推动了报纸文风的转变。原来充斥报纸版面的浪漫小说或煽情报道逐渐失去了吸引力,人们开始把眼光投向现实世界,希望看到对真实世界的客观描写。我们在前面提到过,采访是加强报道客观性的手段。客观报道意味着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报道新闻,同时它也指一种写作方式,即用事实写作。而采访就是得到事实的最有效手段。

19世纪下半叶,随着美国经济军事实力的膨胀,其文化开始向外扩张。1867年5月11日的《纽约论坛报》刊载了一条消息:“莫里斯先生今天前往欧洲担任《纽约先驱报》驻伦敦的国外特派员。”^[2](第287页)。这条简短的消息宣告,世界新闻的收集和传播将发生重大变化。从此以后,美国记者涌入欧洲,使欧洲人逐渐接受了采访活动。法国作家巴斯夏那·戈如塞特(Paschal Grousset)写道:“采访在美国十分猖獗,这种狂热使得这种活动有了在我国扎根的趋势。”^[3](第78页)二三十年后,同样有许多的外国记者登陆世纪末的中国,把采访介绍给了中国报界。

姚文鹤所著《上海闲话》中说:“当时,一般报社主笔、访员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中人仇视之,即社会上一般人,亦以其搬弄是非而轻薄之。”^[7](第57页)。对记者的鄙视来源于文化的偏见,是守旧的表现。早期在国内报刊中供职者,多是没有办法取得功名的读书人,不代表社会主流。戈公振写道:“当时社会所谓优秀份子,大都醉心科举,无人肯从事于新闻事业,惟落拓文人、疏狂学子,或借此发抒其抑郁无聊之意思。”^[12](第85页)也就是说,文人到报社供职被看作是不务正业。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在开明的社会风气下,记者不再是“落拓文人、疏狂学子”所从事的职业,连“名公巨卿”都愿意接受报社的聘书。

三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新闻采访活动都出现在报纸从以政论为本位向“以新闻为本位”转变的时期。这种转变在美国表现为政党报纸的衰落和便士报的兴起。辛亥革命是一块历史界碑,它标志着共和时代的来临。从此,国内媒介的环境开始改变。新闻观念启蒙时代的那种政治色彩渐渐褪去。一批崇尚民主自由、担当社会道义的报人开始致力于发展独立于政党之外的新闻事业^[13](第40页)。

通过考察采访制度化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中美两国新闻采访的制度化都反映了社会进步发展过程。同时也都反映了新闻观念的演变。但由于各国国情不尽相同,所以我国新闻采访的制度化进程有其特殊性。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采访活动是采访传入我国的一种途径。同时,我国第一批名记者和著名报人大都有到外国留学的经历。黄远生曾到日本留学,邵飘萍曾到日本新闻学会听课,同时考察日本的新闻业,徐宝璜于1912年到美国密芝根大学学习新闻学。他们学习并吸收了外国的新闻理论用于指导中国的新闻实践活动。在黄远生出现之前,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都是政治家。从他开始新闻的采访与写作受到重视^[13](第40页)。更可贵的是,并没有生搬硬套外国的新闻理念,而是充分融入了自己对记者工作和采访的理解。例如在论及记者的基本素质之时,邵飘萍强调的几点刚好与日本的松本君平相反^[13](第50页)。又如黄远生提出新闻记者须脑能想、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的“四能”说,用以贯彻客观、真实、公正、全面的新闻报道原则。这些真知灼见都对新闻采访的制度化大有帮助。

新闻采访的历史是现代社会文化史的一部分,但要说清楚采访为什么出现以及它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不容易。在早期,报纸上还没有可以被称为“新闻报道”的文章,采访的出现使记者可以用一种新颖的风格写作,而后采访成了为大多数新闻报道收集信息的手段。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由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扩张、政治民主化运动的不断深入以及文化的发展赋予了新闻采访冲破种种阻碍的力量,使采访最终在20世纪初成为了新闻界的制度和规范。总而言之,新闻采访活动还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只有下力气去研究并解决出现的问题,才能使新闻采访生机勃勃。

致谢:感谢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迈克尔·舒德逊(Michael Schudson)教授对本文写作提

供帮助。

[参 考 文 献]

- [1] 罗以澄. 采访学[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 [2] [美]约翰·霍恩伯格. 西方新闻界的竞争[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3.
- [3] Michael Schudson. The Power of News[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4] [美]迈克尔·埃墨. 美国新闻史[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6.
- [5] 张功臣. 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
- [6] 杨光辉. 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C].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3.
- [7] 徐载平. 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8.
- [8] 方汉奇. 中国新闻事业简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 [9] 顾执中. 报人生涯[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 [10] [美]迈克尔·舒德逊. 探索新闻——美国报业社会史[M]. 台北: 远流出版公司, 1993.
- [11] 郑曦原. 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 [12]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M]. 北京: 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5.
- [13] 单 波. 20 世纪中国新闻传播学(应用新闻卷)[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 [14] 方 蒙. 新闻界人物: 第一辑[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3.

(责任编辑 车 英)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News Interview and Its Causes

ZHENG Yi-hui, SHAN Bo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ZHENG Yi-hui(1978-), male,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omparative journalism; SHAN Bo(1964-), male,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omparative Journalism.

Abstract: Real news interview emerged in the middle of 19th centu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a few decades, newspapers in China and Europe began to accept interview practice. Interview eventually evolved into an institution in early 20th century;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has motivate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nterview; the development of free market, the growth of journalism capital, democratic movement and culture changes are the major cause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interview.

Key words: interview; institutionalization; history; evolve